



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

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系列丛书

李红艳

著

乡村传播与 城乡一体化

——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
之实证研究

Rural Communic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 Positiv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on Citizens and Migrant Farmer-Workers in Beijing

乡村传播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问题，不仅与流动人口自身的地区来源、教育背景、职业类别、社会网络有分割的关系，而且与城市市民群体的开放度、接纳度关系密切，同时，作为城市化产物的大众媒介的报道倾向与人口管理模式对此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书着眼于乡村传播学的视角，借鉴发展学与现代化的基本理念，以构建良好的城乡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主题，采用参与式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焦点小组及深度访谈的方法，结合部门的资料，对城乡一体化关系之良性构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基础。对流动人口与市民、流动人口与管理组织、人口与大众媒介的功能三个层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构建良好的城乡一体化关系，主要有三个重要的因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

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系列丛书

乡村传播与 城乡一体化

——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

李红艳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

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系列丛书

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

——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

著 者 / 李红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李心华 范明礼

责任校对 / 李临庆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289千字

版 次 /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0891-0

定 价 / 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 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李红艳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7
(中国农业大学“985 工程” 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系列丛书)

ISBN 978-7-5097-0891-0

I. 乡... II. 李... III. 流动人口-研究-北京市
IV. C924.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4299 号

中国农业大学“985”研究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前言（代序）

浅议社会转型中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 职业性与专业化

李红艳

2008年，当改革开放30周年的话语叙事模式在组织行为模式，如媒介组织、各级政府组织、诸种学术机构乃至多样的民间性质的活动模式一一展现的时候，大众群体则以自身的日常生活模式和消费理念，演绎着个人生命难以全貌呈现的年代记忆。或者，年代记忆是个体意识在蓦然回首之间的一抹情怀，一声叹息，一个简单的音符，一种难以清晰化的叙述话语。

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岁月中，知识分子群体承担了复杂而多变的社会使命，肩负了确定自我社会身份过程的社会责任。那么，作为职业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和特点是如何凸显的呢？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获取与传统社会的四民阶层身份的逐渐分化有着密切关系。古代的知识分子身份——士大夫群体，通过科举制度的系统而获得了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20世纪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四民社会自晚明以来的逐渐解体，晚清的知识分子已经一跃从士大夫阶层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空间、知识结构和职业选择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纽带发生了断裂，“他们不再是国家精英，而成为自由浮动资源”，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依然

成为一个“断裂”社会，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断裂，二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裂。在这种社会情形下，现代知识分子不仅脱离了与体制的关系，“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许纪霖，2005），城市的兴起、新的知识领域的开启、现代商业的日益拓展又吸引以乡村为居住和思考空间的知识分子离开乡村，来到了城市，彻底扔掉了原有的士绅阶层与社会基层的天然纽带，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渐行渐远，城市的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形成学术群体、组建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期刊的可能性，这种独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和特征的凸显，却加深了这一群体心理上的断裂与分化，不同的选择趋向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中演绎着不同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在这一系列的革命行为模式中，一方面，新的学术范式逐步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20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经登场。另一方面，党派与主义之争凸显，正是在这一剧变中，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陈平原，1998）。

这种学术转型宏观而言体现在学术信仰、学术价值和学术思路及方式的变化，微观而言体现在某一研究成果起到了开启新的学术研究思路，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的影响力上。中观层面则包括知识分子群体思维模式与社会变迁之间互为牵制而又竭力撇清的一种质化的状态。

这种现代学术之转型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了空前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无疑刻骨铭心而又行政化地制造了另一种所谓的“学术转型”。这种“学术转型”以对学院派知识分子群体的非革命化特征为主要立足点，以一系列的思想运动模式为操作性手段，以脱离原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空间为主要行为模式，在30余年的时空中，经历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知识分子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态势上的巨变。有学者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晚清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为前三代，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可以划分为后三代，其中再细划分为1949~1966年为17年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1966~1976）和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几乎浓缩地折射了20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许纪霖，1997）。

这里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后三代知识分子在近 60 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其中，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的转型又是如何发生的。笔者认为，这一转型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一是从行政化、政治化话语到思想性话语的逐渐回归；二是从职业化话语到商业化话语的逐渐过渡；三是从商业化话语到行政逻辑下的职业化话语的转化；四是从行政逻辑下的职业话语到行政逻辑下的政治话语、职业话语、日常话语的转化。这四个层面的转化也大致凸显了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导向与演绎模式，同时也表现出过渡性、中介性和拓展性的特点。1949 年后，随着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确立，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的“依附”者。因此 17 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就其职业而言，单一性和纯粹性逐渐消亡。知识分子在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也由最初的革命思想启蒙者，跌落为革命的“同路人”，直至“革命对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观点为毛泽东的依附说和消耗财富说。他认为“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即依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所有制上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则依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上，依附在无产阶级上。是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请来的教书先生。这两种观点不仅消解了知识分子原有的职业特性和社会特性，而且使得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趋势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这种转向不仅仅是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对社会责任的认同，而且是对自身的社会身份的原罪感的认可。由于自晚清以来，革命被赋予了一种崇高救世的内涵，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知识分子便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参与了革命，并以革命者的身份获得了认同。17 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建构所缔造的革命者身份不再为社会所需要，而被迫“堕化”为国家和社会的被雇佣者。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学术反思和 90 年代的学术期待之后，转而集中于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显现了当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必然性。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勃兴，有对 80 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偏的意图，80 年代学风的“浮躁”和“空疏”是由于旧规范的失落和新规范的尚未形成。就学术发展的规律而言，原有的学术

范型在常态下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出现危机，这时就需要调整，需要寻找新的学术典范，这种学术的自我整合是顺理成章的（访陈平原教授，参见云慧霞主编 2003：39-43）。

伴随着学术转型的发生过程，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经历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归。这种回归与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同步进行。在行政理性的逻辑逐渐为经济理性的逻辑所冲击的情形下，行政理性的资源与经济理性的选择相互结合，形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在学术选择趋向上的混合体。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发生的社会在三个维度上的转型，即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形态转化，在打断了业已发生的学术转型过程的同时，也迫使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发生断裂与转型，经济理性、实用主义的学术选择趋向，在市场经济的自由蔓延、行政垄断资源、个人主义理念无边际泛滥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立场、学术立场、价值与信念，也在发生深刻的断裂。

但现代中国不仅仅是在 30 年的年轮中盘旋，1949 年的刻骨铭心乃至绵延而来的 60 余年的岁月年轮，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叙述层次中，印刻着属于“我们”的记忆。“我们”不仅是工农兵商的组合体，更是了解和认知这一组合体在社会发展脉络中灵魂的震颤与记忆的刻板化过程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组合体，即“知识分子”群体的组合体。

或者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还处在行政资源的垄断与经济理性趋向的两难抉择中，文化理念、价值体系、社会心理等的重新建构，使他们在这一社会转型中变得无所适从，似乎每一种操作性的、工具性的努力在大众媒介的魔化下都成为一种“短暂的过眼烟云”，难以形成稳固而长久的行动模式，或曰社会任务模式。那么，在商业选择和行政选择的两难中徘徊，知识分子还应该做些什么？

笔者认为，知识分子这一职业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理应是重新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进行实践的行动过程。而就学术研究而言，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真问题，描述真现状，合力为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在 21 世纪的进步付出微薄之力，是一条较为现实可行之路，也是知识

分子的专业化、职业化所要求的，而非行政化、商业化、个人主义的选择所要求的。

鉴于此，我们以北京市的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传播关系为出发点，力图以客观而真实的面貌呈现出当代社会结构转型面貌之一角。本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第一，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的手段，尽力将被调查者的原貌与调查者的感受相结合；第二，从微观视角出发，关注中观和宏观的社会问题；第三，关注作为一种产业的大众媒介产业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责任问题，力图为传播学这一学科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密切结合提供一条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论》，新星出版社，2005，编者序。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8、22页。

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云慧霞：《北大问学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9、43页。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乡村传播学视角下的城乡一体化	7
一 乡村与乡村传播	7
二 乡村传播学概念解析	10
三 中国乡村传播学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	31
第二章 研究路径	36
一 选题视角	36
二 研究对象的界定与调查区域的选择	39
三 现有研究状况	44
四 研究设计	53
第三章 被调查者总体概况	55
一 农民工眼中的市民主题调查概况	55
二 市民眼中的农民工主题调查概况	61
三 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调查概况	66

第四章 作为受传者的农民工与市民	70
一 作为受传者的农民工	72
二 作为受传者的城里人	100
小结	114
第五章 传受双方信息传播内容之分析	117
一 信息类别	117
二 信息传播之内容分析	135
小结	157
第六章 传受双方信息获取渠道之比较	159
一 农民工了解城市市民的信息以人际传播渠道为主	159
二 市民了解农民工的信息渠道：人际传播渠道和 大众媒介渠道的作用大致相近	162
三 信息获取渠道比较	166
小结	184
第七章 城乡一体化如何构建：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比较 分析为例	186
一 农民工就业信息来源渠道	186
二 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比较	200
小结	214
第八章 传受双方信息传播之效果比较	217
一 平民生活的城乡一体化：乡村与城市之间	217
二 平民意识的城乡一体化：社会角色与生活场景	225
三 平民视野的城乡一体化：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	250
小结	262



第九章 讨论与思考：城乡一体化与城市的社会场景	265
一 他者想象与自我认同	266
二 大众媒介产业化与城乡一体化之关系之思考	272
三 乡村传播学与城乡一体化之关系的思考	275
参考文献	283
后 记	291

绪 论

作为一个在城乡之间不断迁移的群体——来自于乡村的农民，自中国近代以来便已成为一个特有的现象。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在各个层面不同程度上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正是在这一社会各层面发生着悄然变化的时段，中国近代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诞生了，他们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的冲击下，主动或被动地走出原来被隔离的农村社会，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域，形成了近代意义上所谓的民工潮^①。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三年经济困难伊始，国家为了应对当时的经济短缺，严格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当时工业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但城市化却停滞了。直到1978年，全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82.1%的人口还是农民^②。因此，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农民这一群体回归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给予他们的“正统角色”。正如赫尔曼·凯塞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所说的那样：

^① 参见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

^② 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中国社会学网，www.sociology.cass.cn/pws/luxueyi/grwj_luxueyi/。

正是这些农民，赋予这片广阔的平原以生机。他们身上的蓝袄与田野里的绿苗、浅黄色的干涸的河床，共同构成中国的风景。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黄皮肤的农民在这里生息劳作，这片广阔的土地会是什么样子。这片黄色的土地，既是田畴，又是墓地。它像一片无边广阔的墓场，没有哪块土地上没有坟丘，耕犁在星缀的墓碑间蜿蜒行走，一次又一次地划破土地。世界上没有哪里的农村像这里一样执着于土地并与土地融为一体。这里无数代人生生死死，都寸步不离故土。人属于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人是土地的孩子，永远也离不开土地。不管人口如何增长，他们还紧守着脚下的那片故土，依靠勤劳从贫瘠的自然中攫取生命。他们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他们抱着孩童式的信念，相信死后葬在泥土中就像回到母亲的子宫，生命将再次开始，直到永恒。中国农民像史前的希腊人那样相信死后的生命。土地滋养着他们的祖先的精神，报答他们的勤劳、惩罚他们的懒惰。故土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回忆，他们的纪念；他们不可能背离故土就像他们不可能背离自己；因为他是土地的一部分。^①

他们无奈而安逸地生活在土地与他们的相依为命的关系中，社会结构的固定化使得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千年等待后依然在乡村的土地上遥望。当时代迫使着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的时候，土地对于他们而言的意义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系列农村改革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对农民自身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是其自身的完全历史，而是逐渐转变为一种日益消退的精神性的象征，尽管拥有土地的生活曾是那样地令人安逸，但市场的力量却显得更为强大，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程中，农民离开家乡、离开土地，在城市的空间里寻觅着新的生活空间，就宏观意义而言，农民的流动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同时是一种社会流动，包含了

^① 转引自周宁《牧歌田园——二十世纪西方想象的另一个中国》，《书屋》2003年第6期。

地域流动，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三个方面^①，而这三种流动形式从一个地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而言，又更是一种文化移民。从这个视角而言，无论是哪种层次上的流动抑或是移民，对中国 20 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形态，尤其是 20 世纪后 30 年的社会形态，更是一种乡村空间向城市空间的迁移，在这两个空间长达 30 年的时间绵延中，中国近代社会的人口流动的影子似乎可以看到，同样是时间上的延续、同样是空间上对社会共有资源的享用力度的争夺，但是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因却发生了迥异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第一个宏观的背景无疑便是已经日常化的话语“城乡差别”。无论是在政府的话语表述中，还是在媒介的权利实践中，抑或是在百姓大众的无意识表达中，差别是一个核心的概念。那么，这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何为城乡差别？这是中国在 20 世纪后半叶政府和民间所着力给予合法化认可的一种状态，还是整体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自然历程？抑或是社会现实的一种确切描述？更为贴切的问题或许是：城乡差别的制度化是如何体现的？制度化加剧了城乡差别还是消除了这种差别？

作为客观现实的城乡差别，不仅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上有着重要的区别，而且在人的观念、习俗、文化习惯、日常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网络和人际资源的使用模式上有着重要的差别。这种差别在经历了军阀混战、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之后，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成立后逐渐推行的户籍制度、城乡之间的单向流动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的作用下，从凋敝到衰败，从衰败到复苏的诸种努力，终因制度化的因素陆续宣告了社会实验的失败结局。

换言之，城乡差别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特殊性，首先是由于制度化的强制性而加剧的。其次，不同视角下的城乡差别含义也不尽相同。尽管“城乡”这一概念已经成为近 20 余年来，政府视野、媒介视野和民众视野越来越关注的一个话题，但这种关注却或者有着天然之别：比如，政府视野里的城乡差别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社会问题，而媒介视野里的城乡差别是因在政府议程设置里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在媒介的区

^①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划里也自然而然获取了与现实相关的相应信息量,但是这种信息量更多地是站在媒介市场的力量上进行运作的。民众视野里的城乡差别的含义更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或者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需要,或者是因为“家”的需要等等,城乡差别很现实地就这样存在着。人群在使用着共同的话语权利,使用着共同的话语表达,只是并不具有共同的意识背景和现实背景。^①再次,如何消除城乡差别的解决路径的差异性。是否乡村社会的消失意味着城乡差别的消除?就西方工业化的社会发展经验而言,城乡差别与城市化的发展紧密相关,而城市化又与工业化过程中整个社会阶层的革新和流动有很大的关系,城市化的发展所消除的城乡差别是城乡不平等的观念和和行为,而不是乡村社会实体,换言之,消除城乡差别意味着创造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出现一种新型的乡村。以现代化的名义,追求城市规模的趋势,对消除城乡差别而言,并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②

第二个宏观的背景便是城乡一体化这一现象的实际发生。城乡一体化是指资本、劳动力、物质、信息等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的过程。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城乡之间相互影响乃至变化的发生过程理应是城乡互动的核心内容。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核心内容呢?农民来到城市并寻觅职业,居住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中,在城市空间中享受着城市这一现代化载体所赋予他的诸种物质性的权利。但这种物质性的权利并非纯然是人文意义上的,他们的家在遥远的乡村,定期或不定期地回到乡村生活中去,必然会唤起他们原初的记忆,换言之,我们所设想的城乡一体化之乌托邦在这一层面上展开了:

想象之一: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们,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总是要返乡的。那么,他们就会将自身对城市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传递到乡村,同时又可以将其乡村生活和文化的特色传递到城市中,成为城乡之间传播的受传者,诸如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等等。

想象之二:从城市到乡村感受生活的人们、传递技术的技术员、公

^① 参见李红艳《徘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国农民》,《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5期。

^② 吴江:《我们应当走出一条新的城市化道路来》,2005年11月22日《北京日报》。

司推广员、大学生村官等，可以将对乡村的印象、对乡村社会的认同带入城市，并把城市生活的观念传递到乡村，形成良好的城乡互动。

想象之三：在城市生活的农民，会逐渐地依据城市的生活模式来设计自己的生活轨迹，按照城市形象给予他们的启示，建构属于他们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在城市管理模式中，如居民般地接受组织的管理，认同组织的权力，并在日积月累中向往着并使自己转化为真正的城里人。

想象之四：城市里的居民会逐步接受农民进城这样的社会现实，在自身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认同这种现实，对于与农民工之间的交往保持着乐观而积极的态度。

想象之五：大众媒介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因此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大众媒介会积极、主动地肩负起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交流的桥梁，并作为主要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种想象构成的理想场景是：城乡一体化是在社会群体的自然流动中形成的，这种自然流动在常态中必然会带动乡村社会的发展。城乡一体化在城乡互动的积极循环过程中，也逐渐同时完成了自身的构建过程。

本书试图回答，在大众的视角下，或者说在平民的视野中（这里的平民是指普通的城市市民个体，普通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城乡之间的这种沟通在社会现实中是如何发生的？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接触渠道有哪些？相互接触过程中的信息类型及内容又如何？二者之间的传播效果如何评估？而在这种渐变中，城乡一体化的机制在何种意义上是可能被构建的，在何种意义上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只是一种现实的乌托邦？总而言之，通过相关调查数据和资料，对城乡之间关系的想象和状况，角色与交互状态，给以社会现实图景的回答。

本书阐述这些问题的视角是乡村传播学。乡村传播学概念的初步提出始见于2005年7月20日《中华读书报》的一篇短文“构建中国式乡村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界率先以传播学本土化为契机，结合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学科现实和理论背景，以行动研究的视角为传播学与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初步的设想。继而在论文《构建中国乡村传播